

江苏方志在江户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以《江阴县志》为中心

李玉

宿迁学院，江苏宿迁，223800；

摘要：随着中日间文献交流与跨文化知识转译研究的深化，中国方志在江户时代日本的传播路径与功能性接受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本文以《江阴县志》为研究核心，通过版本考据、引文分析与跨文本比对的方法，探讨其在日本江户时代本草学、语言学及俳谐文化等领域的传播机制与知识再生产模式。文章通过对《大和本草》《重修本草纲目启蒙》等典籍中相关条目的系统梳理，发现《江阴县志》在日本并非作为整本“对象性文本”被阅读，而是以“工具型知识碎片”的形式被有选择性地吸收与转化。研究结果显示，《江阴县志》在植物形态描述、物产名称注释、地方俗语阐释等方面，为日本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地方性知识支持。例如，《大和本草》多处直接引用该志中的物产条目以丰富植物知识系统；《锦窠植物图说》则将其嵌入植物分类描写中，与西方博物学体系进行融合；而在《增补俳谐岁时记栞草》等季语集成中，其节令用语与民俗知识被广泛转引，强化了俳谐文化的文化注解基础。此外，唐话辞书《应式六帖》也吸收了该志中的部分节俗表达与方言词汇，构成“隐性语料库”。本文指出，《江阴县志》的知识体系因其条理分明、信息密度高，具备较强的内容可提取性与结构重组可能性。这使其在跨文化传播中具备“去整体化”“碎片化”接受的适应特性，体现了中国地方志知识在异文化语境中的解构性再组织与功能性重构。综上，本文不仅揭示了中国地方志在江户日本的实际接受面貌，也为理解传统地方性知识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可迁移性与适应性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分析。

关键词：《江阴县志》；江户日本；地方性知识；传播模式；知识转译

DOI：10.64216/3080-1486.25.11.065

引言

作为中国传统地方知识的典型载体，方志文献整合了区域自然、人文等多元信息，构成地方性知识秩序的重要基石。《江阴县志》以其明清之际的成书背景，在物产志、民俗志等方面具有显著特色，其知识体系兼具地方治理功能与跨文化传播潜力。

江户时代汉籍东渐背景下，该志通过长崎贸易、藩学收藏等渠道进入日本知识生产系统，逐步渗透至本草学、语言学等领域。

本研究聚焦《江阴县志》在日文献中的接受痕迹，选取《大和本草》等文本作为分析样本。通过植物知识转译、方志条目重组等维度，探讨其在异文化语境中的再生产机制，进而揭示地方知识的跨文化流动范式。

1 《江阴县志》的版本谱系与舶载路径

1.1 《江阴县志》的成书及文本形态

江阴地方志首修于宋，至明清两代续有刊行，今存主要版本包括明弘治、嘉靖、崇祯及清康熙、乾隆、道光等修本，传承有序，版本体系较为完备。其中，黄傅主修之弘治本、张袞纂修之嘉靖本、李兆洛主持修订之道光本，均为一时名家所成，代表不同时期江阴地域知识系统的编纂水准。

在内容设计上，《江阴县志》不仅强调“地方事实”的历史性与实用性，而且具有较强的文化记述功能。尤其是其中对乡土风物、民俗节令、方言俚语、文人逸事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记录，极大地增强了其文化传播价值。

1.2 江户时代的输入机制与实物流通

江户时代，日本虽实行“锁国”政策来限制海外通商，但对汉籍的输入并未完全中断。其中，那些内容涵盖地理、制度、风俗、物产等方面的中国地方志，因其信息密度高、实用价值强，受到幕府、各藩藩校及私家藏书家的广泛关注。《江阴县志》正是在这一文献流通背景下传入日本，逐步嵌入幕末之前的知识体系。

据巴兆祥（2008）^{〔1〕}统计结果，《江阴县志》在江户中期已有确切的输入记录。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日本江戸時代輸入《江陰方志》的具体情况

船載時間		志書名称	出版年份	去向	来源
和历	阳历				
元禄 8	1695	（嘉靖）《江陰縣志》	1619	加賀藩前田家	《船載書目》《旧藩藏書》
享保 11	1726	（康熙）《江陰縣志》	1683	紅葉山文庫	《商船書目》《秘庫書目》

这些实物流通案例表明,《江陰縣志》不仅被日本知识阶层视为“可读之书”,而且由于其地方治理与物产风俗并重的结构特征,在船载文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3 《江陰縣志》的知识属性与接受模式

据笔者观察,《江陰縣志》作为地理类汉籍,在江戶日本的接受过程中逐渐转化为一种“工具型”知识文本。从现存藏本及文献引用情况来看,其内容至少在三个层面发挥了作用:一是作为本草、地志类著作的知识补充,例如《大和本草》《重修本草綱目啓蒙》中引用了该志中的物产条目和俗名注解;二是作为俳谐文学中季语考证的文化注释基础,见于《增补俳谐岁时记菰草》的释注;三是作为语言类工具书的资料来源,例如《应式六帖》中收录的“杨花萝卜”等节令用语就出自该志的物产志记录。

2 在日本本草学与博物学中的知识迁移

2.1 《大和本草》中的方志片段化引述

《大和本草》是江戶时代早期由儒学家、博物学家、教育家贝原益轩于 1709 年（宝永七年）刊行的本草学著作,被视为日本独立本草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刘伟婷（2023）的研究,该书在吸收《本草綱目》体系的基础上,强化了实地观察、图谱佐证及地域差异性的描述,在博物学与民用本草融合方面具有开创性特征。^[2]《大和本草》多处条目明确引用了中国地方志,尤其是《江陰縣志》,用于说明植物的形态、生态、别名及地方用途。现存资料可见以下三条标注“江陰縣志”的直接引文实例:

《大和本草》多处条目明确引用中国地方志,尤其是《江陰縣志》,用于说明植物的形态、生态、别名及地方用途。现存可见以下三条为《大和本草》中标注“江陰縣志”的直接引用实例:

2.1.1 “楓”条（十二・雜木）

楓（つき）江陰縣志曰、楓質堅而勁、多葉、繁陰人家門巷多樹之、葉も木理もけやきに似たり、葉お見ては別ちがたし、隻其木理お見てわかつ、一類別物な

り、葉はぶなの木にも似たり、古は楓にても弓お作れり、楓弓と雲、字彙雲、楓木名、堪作弓材、^[3]

2.1.2 “楓”条（十二・雜木）

楓（おがつら）江陰縣志曰、似白楊葉厚枝弱善揺、故字從風、霜後色赤、合璧事類、楓葉円而岐分三角、今案和名に楓おおがつらと訓ず、その葉まことに白楊（はこやなぎ）に似て両々相對す、賀茂の祭に用るかつらはなり、又筑紫にてもかつらぎと雲、葉かへでより大きなり、花はさゝげの花のごとく三四月開く、形状は似たれども、からの書にいへるやうに、おかつらは紅葉せず香なし、是真に楓なりや未詳、朝鮮には楓あり、香ありと雲、桂お順和名に、めがつらと訓ず、おがつらに對す、楓おかへでと訓ずるはあやまれり、かへでは機樹也、

2.1.3 “蘿蔔”条（五・菜蔬）

蘿蔔 又萊菔とも溫菰とも雲、和名於保根（おほね）、今国俗大根と雲、南北埴沙無不宜、民用に最有利益、群菜の第一とすべし、四時常にあり、夏生は秋冬の者に比するに、形同けれども味おとる、〈○中略〉凡大根に種類多し、大大根（○○○）あり、是一時種蒔之力と土地の肥壤によれり、又種子も別にあり、水蘿蔔（○○○）、群芳譜雲、形白而細長、根葉但淡脆、無辛辣氣、可生食、亦有大如臂長七八寸者、則土地之異也、摂州天満の邑の辺、宮〈の〉前大根と称するあり、形小にして長し、河州守口にはお以糟漬とす、大坂にも亦然す、冬月に根長し、或乾して遠に寄す、〈○中略〉江陰縣志載楊花蘿蔔曰、暮春時有之、形細長味松脆、今案にこれ三月大根（○○○○）と称するものなるべし、もち大根（○○○○）あり、是も三月大根の類也、葉高からず、地に付て生ず、根大にして味からし、三月大根もち大根此二品は、冬大根尽て三月に味よし、もち大根は其根土上に不出、是常の蘿蔔にかはれり、故にほりいり菜と雲、伊吹大根（○○○○）は、江州伊吹山に自生す、根短して肥大、其末鼠の尾の如く、小にして長し、味甚辛し、煮熟すれば甘し、葉は大根と

同じ、ねずみ大根(〇〇〇〇〇)とも雲、尾州に種る猶よし、他邦にも種子お伝へてうふ、尾州の産に不及、尾張大根(〇〇〇〇)、長鼠大根と不同、紫大根(〇〇〇)あり、茎も根も紫色也、又葉に刻欠多く、味佳き一種あり、又葉似菊根小に、冬より夏に至て葉お食するあり、味よし、暹羅大根、其種自暹羅来る、京都にて近年隠元菜と雲、葉大に根紅に、内に赤白の暈紋あり、うずのまひるに似たりとて、うづ大根(〇〇〇〇)とも雲、葉の心も紅し、味甘し、冬栄ふ、これお芸臺と雲は非なり、夏大根(〇〇〇)、生にて食へば脱血す、産前食へば小産す、

这些引文表明,《江阴县志》作为地方性知识文本,在日本博物学语境中被纳入《大和本草》的植物知识建构中。其内容不仅被用于佐证植物的形态、别名与用途,还与《字汇》《合璧事类》《群芳谱》等其他汉籍并置,构成跨文献的注释网络。在这一过程中,《江阴县志》原文经过语义提炼与结构适配,成为适应日本学术语言系统的“知识片段”。

这些引文表明,《江阴县志》作为地方性知识文本,已经被纳入日本博物学语境的《大和本草》植物知识建构之中。其内容不仅被用于佐证植物的形态、别名与用途,还与《字汇》《合璧事类》《群芳谱》等其他汉籍并置,构成了跨文献的注释网络。在这一过程中,《江阴县志》原文经过语义提炼与结构适配,成为适应日本学术语言系统的“知识片段”。这种“片段—重组—再分类”的跨文化转译机制反映出江户时期日本知识人对中国地方志内容的选择性吸收。例如“楓”条中,《江阴县志》关于“似白杨、枝弱善摇、霜后变红”的描写,被嵌入《大和本草》对京都贺茂祭祀用植物的解释之中。这表明地方志条目并非被机械照搬,而是与日本本土植物文化知识相融合并重新诠释。

2.2 《锦窠植物图说》中的分类融合与版本交错

伊藤圭介(1803-1901)是近代日本植物学与本草学的奠基人物之一,其代表作《锦窠植物图说》融合了西方博物学分类体系与中国传统本草知识。在该书中,有数处明确标注《江阴县志》为引文来源,例如:「榆科 欒譜」条,记为:“江陰県志、皮トレテ遠見スルトヒロガリテバラリトシタル木ノ形ナリ、ケヤキノ上品ニテ是ニハジヨリニ目理アリ、木サクシ樹皮(図)ノ目如此、花ハカヘデ類ノ花ノ如シ、赤キモノツキゲ

ヤキナリ、白キモノシラケヤキ”^[4];再如「橙橘科 橘譜」条,记为:“江陰県志云:金柑実小如弹丸、木高三尺許、一種長寸許者名馬柑”^[5]。这两条引文涉及木本类树种“楓”与果实“金柑”,显然是在分类描述中将《江阴县志》作为知识来源之一。

根据对现存各版本《江阴县志》的比对结果可知,“楓”一条见于(嘉靖)《江阴县志》^[6],而在(康熙)《江阴县志》中未再载录,说明该条目可能仅在早期版本中存在,后续版本或因编纂取舍而被删略。相反,“金柑”一条在(嘉靖)《江阴县志》中并未见载,而是在(康熙)《江阴县志》中首次出现,志书在“果类”中细化了“金柑”记载,具体描述其“实小如弹丸”“木高三尺”^[7],展现出对植物形态特征的关注。

结合巴兆祥(2008)对日本江户时代输入《江阴方志》的版本考述,可推测,《锦窠植物图说》所引用内容来源于多版本《江阴县志》。其所引内容涉及“楓”,较可能出自明代嘉靖本;“金柑”,则更可能源于清代康熙本的相关记载。鉴于江户时期中国地方志的广泛流传,以及大量抄本、节选本的存在,伊藤圭介所接触的文本是否为原刻本尚难确定,也可能通过《大和本草》或其他转引类典籍间接获取。将方志知识转译入博物分类体系的这种做法,是中日地方经验向科学知识转换的重要例证,也反映出中国地方志在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所具有的实用价值与再生价值。

2.3 《重修本草纲目启蒙》中的地方知识嵌入

小野兰山(1729-1810)是江户时代中后期最具影响力的本草学者之一,其门人将其讲义整理汇编成《重修本草纲目启蒙》,该书长期被视为日本本草学与中国本草典籍相结合的代表作。通过对该书的比对,可以清楚发现“大豆”、“灌木”等条目的注释引用了《江阴县志》的记载。例如:

大豆 時珍ノ説ニ有二黑白黄褐青斑數色一、(〇中略)青ハ青大豆ナリ、揚州府志ニ大青ト云、宗奭ノ説ニ緑ト云ト同ジ、緑大豆ナリ、緑豆ニ非ズ、俗名アチャマメ、一名アチャダ、(勢州)アチャニブ、(播州)アチャヅル、大ニシ テ色青キ豆ニ、淺深ノ品アリ、深キモノハ青皮豆(〇〇〇)〈授時通考〉ト云、淺クシテ銀杏ノ色ノ如キモノヲカゲマメ〈勢州〉ト云、漢名白果青(〇〇〇)〈江陰縣志〉又裏マデ青キモノアリ、コンリンザイ〈阿州〉ト云、一名コリンザイ、アチャギ、〈佐

渡)ズイアヲ、〈江州〉肉裏青(〇〇〇)〈大倉州志〉ト云、又骨裏青、透骨青ノ名、授時通考ニ出^[8]

该引文显示兰山整合了《江阴县志》中有关大豆品类颜色特征的信息，并与其他汉籍如《授时通考》并列使用。这种跨文本的信息整合方式，体现了地方志知识被再组织为日本本草语境中的分类参考。这一引用痕迹表明：《江阴县志》所载的地方性物产知识，已通过一定形式进入日本本草知识体系，被用作解释品类差异、俗名来源与形态补充的材料。其在“再编码”过程中的功能，是将地方志的经验性知识，嵌入以植物为中心的科学语境之中，构成中日知识转化的真实路径之一。

3 日本语言学与俳谐文化中的方志知识转译

3.1 俳谐岁时记中的节令语料再加工

江户时代中期，俳谐诗坛对“季语”和“岁时”文化元素的表达精致程度不断提升。与主要以经典文献或大型类书为代表的汉籍不同，中国地方志因其地理信息、物产记载、生活风俗、节令安排等内容详实、条理清晰，被日本学界视为兼具实用性和实证价值的地方知识资源，非常适合作为考证、注释以及季语借用的素材来源。

以曲亭马琴于享和三年(1803年)编纂的《俳谐岁时记》为例，该书是日本季语集的重要奠基之作。嘉永四年(1851年)，蓝亭青蓝对其进行了增补，编成《增补俳谐岁时记采草》，大幅扩充了季语注解的内容，并采用五十音顺检索法，使其更适应幕末至明治、大正时期的流传与使用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增补俳谐岁时记采草》引用了多种汉籍方志文献，包括《镇江府志》《江阴县志》等江苏地方志，作为解释季语中动植物或乡俗用语的依据。^[9]例如，据笔者观察，“三月大根”词条下注有：

江陰県志：蘆菔一種長く、名付けて楊花蘆菔と云^[10]

通过对《增补俳谐岁时记采草》注释条目的比对考察，可以发现其中的内容很可能是通过《华实年浪草》等中间类书将地方志资料引入季语注释中的。^[7]这种“间接引入—再解构—文本整合”的转译机制反映了地方志信息在俳谐季语构建中的文化适应路径。

3.2 唐话辞书中的方志片段与语言功能化

江户时期，随着系统整理中国知识的需求不断加剧，

许多面向学习者或汉文读者的词汇工具书性质的唐话辞书应运而生，如《徒杠字汇》《俗语解》《应式六帖》等。这些著作往往罗列了日常生活场景、物产名物、风俗礼仪、四时节令等方面的词汇表达，既便于记忆，也便于翻译和注释之用。

在这些唐话辞书的词汇构成中，出现了大量与中国地方风俗、节令饮食、礼俗叙述相关的词目。通过对比相关文本可以确定，不少词条的内容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地方志，尤其是《江阴县志》《八闽通志》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志书。

例如在《应氏六帖》中，“楊花蘆菔(三月ダイコン)”词目下注记：“楊花蘆菔 江陰縣志曰 暮春时有之，形细长。”^[11]该内容与《江阴县志》所载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显然是转引自地方志。

此类引用说明，《江阴县志》等地方志文献在江户时代唐话辞书中构成了一种“隐性知识库”：其内容虽未进入正式目录体系，却通过节选、转引等非系统化方式被整合进日用辞书与学习参考书。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献中的方言称谓与节俗描述，不仅拓展了语义解释的多元维度，更通过文化语境建构强化了工具书的文化阐释功能。

4 结语

本研究聚焦《江阴县志》在江户日本的传播轨迹，发现其内容接受呈现显著的碎片化特征。例如，植物知识通过《大和本草》《重修本草纲目启蒙》等被选择性吸收，而民俗记载则经由《增补俳谐岁时记采草》等进行文化转译。这种非整体性接受模式揭示出地方知识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解构与重构机制。

从内容形态上看，《江阴县志》中关于物产、风俗、节令、语言等方面的记载，由于描写详实、表达具体，具备良好的可提取性和再编码价值，因此能够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被系统引介。无论是在本草条目的形态补充中，还是在语言工具书中的词汇分类中，抑或在季语集注对民俗语境的说明中，《江阴县志》的内容都发挥了间接的实用功能。

由此可见，《江阴县志》并未被作为“对象文本”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而是作为“工具型文献”被日本学者选择性地加以借用。这种基于内容而非整本接受的传播模式，呈现出地方志知识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可拆解性、适应性与再组织性。

参考文献

- [1] 巴兆祥. 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619+631.
- [2] 劉偉婷.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本草綱目』の受容について—『大和本草』の考察を中心に—[J]. 国際文化研究(オンライン版), 2024 (30), 56.
- [3] 貝原篤信. 大和本草(卷十二)[M]. 永田調兵衛, 1709-1715, 1-28.
- [4] 伊藤圭介. 錦窠植物図説(楡科 櫟譜)写本[M]. 1803-1901, 26.
- [5] 伊藤圭介. 錦窠植物図説(橙橘科 橘譜)写本[M]. 1803-1901, 106.
- [6] (明) 赵锦修、张袞纂. (嘉靖) 江阴县志卷六[M]. 明嘉靖刻本.
- [7] (清) 沈清世修、陳寅亮纂. (康熙) 江阴县志卷五[M]. 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 [8] 蘭山小野先生口授[他]. 重修本草綱目啓蒙(卷十七)[J]. 菱屋吉兵衛 [ほか9名]. 1844, 31.
- [9] 植木久行. 『増補 俳諧歳時記采草』所引漢籍考[J]. 人文社会論叢 人文社会篇. 2009(21), 26.
- [10] 曲亭馬琴編、藍亭青藍補. 増補俳諧歳時記采草[M]. 河内屋和助等(三書堂), 1851, 68.
- [11] 長澤規矩也(編). 唐話辞書類集第12集[C]. 汲古書院, 1969, 487.
- 作者简介: 李玉(1989. 12. 31—), 女, 汉族, 山东济南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日本语言文化、中日比较文学。
-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日本江戸时代汉语教科书中江苏形象的建构研究”(2023SJYB2351); 2024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地方志专项课题“江苏方志在日本江戸时代的流播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 “24SFZC-11”); 宿迁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明清时期日本汉语教材中的江苏形象构建”(校 2022XRC035); 宿迁学院高级别纵向科研培育项目“明清时期日本汉语教材中的中国形象建构”(校 2022XKYJ012); 宿迁学院高级别纵向科研培育项目“日本江戸时期汉语教材与明清小说海外传播的关联性研究”阶段性成果。